

中国传统文化论纲

主编

张
海
鹏

臧
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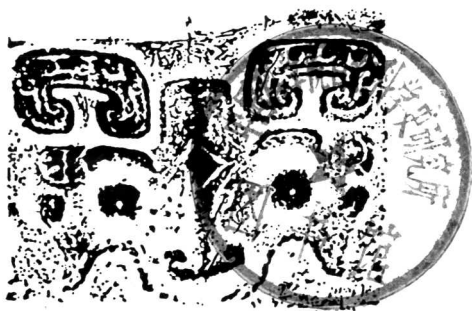
版
社

中国传统文化论纲

主编 张海鹏 臧宏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良志 张海鹏 郑晓江
胡炳生 裘士京 臧宏



安徽教育出版社

22.3
548
3 053266

中国传统文化论纲

张海鹏 臧 宏 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社科联照排中心照排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50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5336-1969-2/G·2505

定价:12.8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在往昔的沧桑岁月中创造、积累起来的文化宝藏,它记录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发展轨迹,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与辉煌。这份丰厚的遗产,是中国人民特有的,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所谓“传统文化”,应该说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它涵盖的内容,不只是哲学、史学、文学、医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以及音乐、绘画、书法、伦理、道德、教育、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方面的东西,同时也包括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交通乃至饮食、服饰等等外显或内隐的行为特征和现象。文化是象征的总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产物,也是人类创造能力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便是中华民族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中创造能力的整合,当然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结晶。不过,当代人在“传统文化”这座宝山上钻探、采掘、冶炼的侧重点则是精神方面的层面,也即是在“小文化”这个圈子里辛勤劳作。过去,中国文化史的范围也大致如此。今天,“文化”的概念放大了,但由“小”及“大”要有一个过程,同时,写“大文化”也不是这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

当前,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其中,精神文明建设更是处于关键时刻。如何把传统文化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与现代文化的精粹交融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重

大课题。我们作为高等学校教师，又是从事人文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应当参加到这个大课题的宣传与研究之中，从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一石一瓦。所以，几年前，我们便有撰写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的愿望。

正巧，1994年秋，省教委高教一处同志与安徽教育出版社总编童本道和编辑彭克明同志来向我们约稿，他们希望出版一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物奉献给高校的学生和广大青年同志，使之获得有关传统文化的知识与智慧，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真、善、美的教育与熏陶，从而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的作用。这样，便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近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两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周知的。但也无庸讳言，在前进的征程中，也出现一些负效应。在精神生活领域里，大家议论最多的是：许多早已扔进了历史垃圾桶里的东西，如今又沉渣泛起，传统的道德、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非常淡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情谊比较稀薄，在社会生活中，不时觉察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不良风气，有的见利忘义，有的甘愿充当金钱的婢女。此外，在一些城乡“反文化”现象也屡屡出现。凡此种种，这同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的国度，都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传统道德，一向重视做人，注重人生价值，把“舍生取义”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取向。而做人就是从“修身”做起，然后“齐家”以及于“治国”，认为只有“身修”才能“家齐”以至于“国治”。往日的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的具体内容虽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按照今天的道德准则，吸取其中的精华，提倡做人，提倡修身，提倡建立温馨和谐的家庭，提倡报效祖国，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在当前来说，还是完全必要的。顾炎武曾经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宣扬和提倡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匹夫有责”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便利用教学之余，抽出一些时间仓促草成了这部书稿。

我们之所以将这部书稿定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纲》，是从以下两点考虑的。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具体的文化，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如兵马俑、《四书》、《五经》就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它虽然包含着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活的东西，但毕竟是过去留下来的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是一个死的东西。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既是财富，又是包袱”，既有正面效用，又有负面效用，而且二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剥取活的东西、有积极价值、起积极作用的东西，必须要借助于逻辑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其二，前面已经提到，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多采，所涉及的面也很广泛，要想在这篇幅不大的书里把它的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来，那是不可能的。所谓“论纲”，意为“举要”，也即是在传统的文化领域里，有选择的写一些影响深远、内在联系比较密切、现实价值较高的内容；同时，目前书肆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已有好几种，为了避免过多的雷同，既是“举要”，则取舍的自由度也比较大些。

在研究和表达的方法上，本书作者力图做到如下几个“结合”：一是史与论的结合；二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结合；三是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的结合；四是历史的解释与现实的评述的结合；五是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要做好这几个“结合”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认为，从这几个“结合”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条正确的路子，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路子前进，待再版时，一定会把本书修改得更好一些。

当前，在学术界掀起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方兴未艾，大家见仁见

智，硕果丰盈。我们在撰稿过程中，也参考并吸取了同仁们的一些成果，在此，谨致谢忱！

这本《中国传统文化论纲》，是按照各人的专业特长分工执笔的：历史地理环境部分是裘士京教授撰写的，哲学和教育部分是臧宏、郑晓江两教授撰写的，史学部分是张海鹏教授撰写的，科技部分是胡炳生教授撰写的，语言和文学艺术部分是朱良志教授撰写的。在定稿过程中，安徽教育出版社童本道总编和责任编辑彭克明同志都投入了一定的精力。由于写作的时间非常短促，加上我们作者其它的任务又重，以致在书稿草成后来不及精雕细刻。我们作为本书的主编，由于水平的限制，也未及进行细致地加工润色，书中的错误不当之处，欢迎读者们的指正！

张海鹏 臧宏

1996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文化产生和衍化的地理环境·····	(1)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经济和社会土壤·····	(14)
第三章	汉字:中国文化的符号基础·····	(30)
第四章	中华原典——民族精神的开端·····	(51)
第五章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70)
第六章	中国传统人生观·····	(94)
第七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113)
第八章	中国人的死亡观·····	(138)
第九章	儒家的教育思想·····	(159)
第十章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182)
第十一章	天学——中国古代的时空观·····	(210)
第十二章	重温数学大国的风采·····	(234)
第十三章	系统平衡的中国传统农学·····	(258)
第十四章	古代人体科学——中医学·····	(276)
第十五章	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	(294)
第十六章	灿烂的艺术成就·····	(326)

第一章

中国文化和衍化的地理环境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相似或迥异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既非造物主的恩赐,也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该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创造、积淀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产生和衍化,以及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那些民族的文化生态有着深刻的联系。文化生态不仅与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

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可分为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前者主要指某一地理位置以及这一地理位置上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地文生物等等外部自然因素。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都离不开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生存条件、活动舞台和发展基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精神都在一定的地理条件下孕育、产生和衍变发展。我们批判形形色色“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见,同时也不赞成任何漠视地理环境重要性的论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本身便是自然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要受自然法则的制约,人类生活资料的获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创造,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探讨中国

传统文化的奥秘，首先应了解中国文化赖以产生和衍变的历史地理环境。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恢弘地基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漫长文明发展中，创造出独具风格、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形成世界上仅见的延绵不绝、高峰迭起、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系统。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广袤而神奇的东方大地，这座文化大厦是耸立于其它古文化所不可比拟的恢弘地基之上。

中华民族栖息繁衍于东亚大陆，幅员辽阔，腹里纵深，有广阔的回旋天地，适宜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一切构成了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的基本因素。概而言之，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地域辽阔，地貌复杂的半封闭性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经秦汉、唐宋历代先民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元明清时代的融合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东西跨越 60 多个经度，南北达 50 个纬度，方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中国文化就滋生繁衍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及东南、西南崇山峻岭间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域约有五百多万平方公里，其辽阔和生存条件的多样性复杂性为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打开亚洲的地形地貌图，我们可以看到，以著名的帕米尔高原为中轴，一系

列高兀突起的山脉将亚洲分割为中亚、东亚、南亚和西亚。中国西北抵帕米尔高原的东麓，从关中出玉门关，阻隔于纵横数千公里的荒漠和延绵起伏的山地、雪峰，加上险恶的气候，自古有“风灾鬼难之域”之称，使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充满险阻。至迟从西汉开始，人们历经千难万险打通了从中原腹地通往西域的道路——丝绸之路，从此，在这条中西通道上留下了使臣、商贾、僧人、教士、军人的足迹和尸骨，在漫长的古代这浩瀚而高寒干旱的地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西北地理极限。

中国的北部是广漠无垠的草原，其东北则是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和北极冰原，虽无高山大川的障碍，要想穿越也是困难重重。长城内外是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斗争融合的战场，其外缘以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为限，再往北就人迹罕至了。中国的西南耸立着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许多山峰超过海拔 7000 米，犹如一道道插入云霄的冰川，阻隔了中国与南亚的交通，逾越这一天然壁障较之西域的流沙、北部的荒原更为艰难千百倍，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只能绕道丝绸之路间接交往。即使中国内地通往西藏腹地的交通也充满艰险，直到唐代翻越重重雪峰，峡谷的“唐蕃古道”才得以开通。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山水相连，但南中国在古代相当长时期开发较迟，加上热带丛林瘴疠盛行，地旷人稀，被视为苗蛮化外之地，与中原交通往来在隋唐以前很不顺畅。中国的东部是浩瀚的太平洋，自黑龙江东部沿海至东南沿海有延绵 2 万多公里的海岸，沿海的交通早在先秦就已兴起，唐以后日益发达，只是大多局限于近海，明代郑和下西洋可谓古代空前绝后之举，却并未导致中华民族大规模向海洋发展。

中国文化赖以产生和发育的东亚大陆疆域广大，回旋余地开阔，由于周边各类自然壁障的围护，使其远离其他文明中心，这种

地理环境造成的半封闭性对文化特质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制度又从经济、政治诸侧面强化了这种封闭性,农业经济下追求稳定、安逸的心态和自我禁锢、夜郎自大的心理根深蒂固。中国文化因封闭而趋于僵化的状态在明清以降显得尤为突出。

二、地势西高东低,气候复杂多样

中国西高东低,北寒南热的地貌气候条件有别于其它古文化区,形成又一特色。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65%。高山、高原和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构成西高东低、落差显著的地貌特征。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雪峰林立,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许多山峰超过海拔 7000 米,气候以高寒为特点,是中国地形“三大阶梯”中最高一级地形阶梯。青藏高原以东是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带,横贯中国的长江、黄河以及流经东南亚的澜沧江都发源于此。此地东北至东南,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与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间相分布,海拔高度降至 2000—1000 米,构成以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为一线的第二级阶梯。其气候一般为干旱或半干旱性。西北内陆受山岭阻隔,无论南方或东方的暖湿气流均无法影响到该地区,成为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中国的东部地区平均海拔 500 米以下由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江南大面积的丘陵低地、河流三角洲地带构成地势最低的一级阶梯。东部地区受东南季风的影响显著,气候湿润多雨。

中国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南北两端的少部分地区伸入热带和亚寒带,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暖温带,气候适中,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幅员广大,加上地貌繁复,中国的气候呈现多样性的特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中下

游地区更适宜于人类的生活、生产,遂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和繁盛之区。其他文明古国也大都崛起于北半球的相当纬度之内,所不同的是中华文明的滋生和繁衍不是仅仅依托于一个气候带,一条或两条流域有限的河流,而是扎根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差异颇大的区域,自然和人文的互补性强,文化面貌也更丰富多采。

中国多样性气候为农业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东部地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或炎热,成为著名的农耕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其北部形成以小麦、粟、稷等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其南部则是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西部和长城以北气候偏冷、雨量稀少,自古即为畜牧区。南北、东西的差异在经济结构、生活习俗、文化面貌、民俗风尚等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别,甚至大相径庭。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开始即因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其后在不断衍变中直接受到人文因素的作用,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辽阔的疆域,复杂的地理环境,不仅提供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可能,而且也文化的发达、交融、转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文化的沉淀和积累营造了恢弘的基地。

第二节 中国与其它文明古国地理环境之比较

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远隔万水千山,中华文化是在基本独立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它不仅风格独具,而且绵延数千年而不断有所创新。从地理环境考察各文明古国,中国以其领域浩瀚、地形地貌与气候条件繁复而著称,为其它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其他文明古国的地理环境各自有别,建立文明大厦的基础也不尽相同。

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摇篮,从尼罗河第一瀑布下游到“下埃及”三角洲地带,包括“上埃及”狭窄河谷平原,是古埃及文明的中心地区,其适宜于农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地域仅三四万平方公里,大自然赐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物产,其西部是浩茫无际的利比亚沙漠(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东部是地势起伏的东部沙漠,其北部则是地中海,与欧亚大陆相隔并不遥远。埃及文明滋生发育的地理环境显得局促而窄小。古埃及几乎孤立于世界其余部分之外,依赖于尼罗河定期泛滥保证了土壤的肥沃和收获量,从而给尼罗河流域和三角洲地带的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创造了自然的前提。在埃及三角洲的东北角是其通过苏伊士地峡进入亚洲,通过西奈半岛到巴勒斯坦、叙利亚等西亚国家的主要出口。这些自然地理特征对埃及文化的特色和发展速度的快慢产生较大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轫于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中下游平原,当地气候宜人,土地因两条河定期泛滥而变得肥沃并有利于灌溉,较之两河流域上游的干旱地带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粗犷农业的发展。两河流域的西部是叙利亚沙漠,以东是干燥的伊朗高原和扎格罗斯山脉,当地先民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最早培植了半干旱性的大麦和小麦。两河流域适宜人类农耕的仅几万平方公里,即使加上毗邻的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滨海地区,组成历史上称之为“肥沃新月带”,其面积仍十分有限。美索不达米亚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悠久发达的古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一度成为欧、亚、非三洲连接地区的文明中心。

希腊文化发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依山傍海的小块平原之上。希腊的地理特点是近海而又多山,陆地交通不便,其本土面积窄小,分散成许多小城邦,周围有许多海岛。这一地理特点使希腊人并不局限于本土,而是很早就向海外拓展,寻求更多的土

地、人口和财富，从希腊渡海往南经克里特岛可达埃及，往东由小亚细亚可抵巴比伦，这些文明古国对早期希腊文化的发展曾给予有益的影响，也使希腊成为地区文化融合的中心。

印度亦是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大部分是一个巨大的半岛，半岛的北部横亘着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不仅阻遏了古印度人的北进，而且也隔断了南北热冷气流的交流，使地处南亚的印度置于热带性气候控制下，气候的复杂性远不及东亚大陆。印度文化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和莫恒达罗周围的相对干旱地区，当位于南部的恒河流域也开发出来后，印度的农作物也由大、小麦而发展为水稻，印度的经济潜能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挥余地，其适于耕种的面积增至二三十万平方公里。印度的海岸线较长，但沿海地带被切割比较少，仅南部沿海有适于设港的浅海湾，面对浩瀚的印度洋，其航海业的长期不发达与古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由上所述，文明发达最早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地理环境方面的优势，这是文明得以萌发，文化得以昌盛的主要因素。与中国相比明显的差别是，中国文化的滋生地拥有相隔数百公里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个气候带，拥有东西、南北差异显著的气候、土壤、动植物群等地理生态格局。中国领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这种恢弘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气候条件，必然使文化呈现丰富的多元特性，同时也为不同地区文化相互借鉴、彼此取长补短提供了便利，为不同部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中国文化多样化纵深 发展和文化中心的转移

复杂、辽阔、多元的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多样化纵深发展的空间条件。

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星罗棋布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数千个遗址，所呈现的是按区域划分的具有不同内涵的文化面貌，其中既有人类发展过程中带有共性的内容，也有因地理条件不同而呈现的相异特色。考古发掘的大量实物资料，使沿袭已久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唯一摇篮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证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北方的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在同时期黄河流域文化发展水平之下，可以说是同时期平行发展，相互影响。各地文化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区系。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绝非局限于黄河中游的狭小地区，而是散布于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之内，其起源期至少由六大区系组成，在某种程度上文明之光犹如满天星斗。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并不否认视黄河流域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抑或摇篮的观点，而是客观地将中国文化的滋生和最初的发展置于更为广阔的地理环境中来加以考察，这不仅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而且也以为以后的历史证实是正确的。

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性状态，经夏商周的发展，显露得更为清晰，形成各具特征的区域文化。大而言之，黄河流域的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东部温暖湿润地区的农耕文化

与干燥的西部、北部地区的游牧文化更是大相径庭。小而言之，即使是纬度相当，分处江河不同地段的区域文化之间也有各自的特色，如面海负山的齐鲁文化与“四塞之国”的秦文化，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均多相异趣。秦汉王朝将各地不平衡发展的文化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逐渐确立了儒学在大一统文化中的尊崇地位，中国文化从此在儒学光环笼罩下从多元状态走向定型化的一元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显示的学术自由被专制主义强权所扼杀，文化多样性的光辉也随之黯然失色。随着专制制度的日趋强化，思想上文化上的禁锢日益森严，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潜质受到致命的摧残。中国文化自西汉中叶以后呈现的一元状态，即“经学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状态并不表明各地文化的完全雷同，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存在着相异的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农业民族对土地的依恋，对男耕女织田园生活的向往而形成的安土重迁的观念。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形成尚武好斗的粗犷豪放的性格。而生活在海滨的人民则致力于海上交通和渔盐之利，富于冒险精神。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元状态和生活习俗的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强烈的地域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差异，使儒家思想在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汉族与非汉族之间，不同地域的汉族之间在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自从迈入文明社会以后，各朝代的都城即为该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数千年间，中国各王朝的都城有规律地经历了多次迁徙，这与大多数古老国家的都城较为稳定甚至单一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埃及的开罗、古罗马（现意大利）的罗马、印度的德里、英法的伦敦、巴黎等，即使有过几次短暂的迁都，不久又回到原地。而中国大体上沿着自东向西，以后又由西北而东南，最后到元明清